应星 李猛 编

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

——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
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

——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

应　星　李　猛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编前语

毫无疑问，传统无论是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学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1991：32）曾经说过："传统远不止是相继的几代人之间的相似的信仰、惯例、制度和作品在统计学上频繁的重现。重现是规范性效果——有时则是规范性意图——的后果，是人们表现和接受规范性传统的后果。正是这种规范性的延传，将过去的一代与现在的一代联结在社会的根本结构之中。"然而，当我们作为社会学界的学者，若要问起"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传统何在"这个问题时，却发现自己不免会陷入尴尬之境。到底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似乎在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学科中还没有取得共识。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三十多年后，一个新的传统已经诞生了吗？三十年对一个学科来说似乎还过于稚嫩，特别是种种宏文的作者们都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想象似乎还没有经历历史的沉淀，他们的洞察似乎还没有经历时间的筛选，他们似乎还没有资格进入传统的神圣行列。特别是对于某些眼光只盯住所谓"国际前沿"的人来说，他们心中所向往的只是"与国际接轨"，而常常不屑于把本土学者的当代著述列入参考文献中，以免自贬身价。

那么，在留学热持续了近三十年后，那些在海外训练有素、学业有成、名望日隆的华人社会学家拥有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吗？

他们的确拥有社会学的传统，只不过他们所拥有的似乎并不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研究的是中国问题，但其基本预设、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却属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当代社会学的传统。

因此，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一百多年后，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年后，我们还不得不问自己：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究竟在哪里？之所以值得追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对中国社会学界来说，如果不探本求源，不强调传承，而只是一味地嫁接、拼凑、移植和复制西方的成品，被西方的学术时尚牵着鼻子走，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也就没有能力发现和深化自己的问题。西方社会学今天的成熟，恰恰是以不断回溯传统、解释传统和继承传统为前提的。而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目前却很少自觉地去培植和呵护自己的独特知识传统，还没有走出亦步亦趋的格局。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培植中国社会学自己传统的关口了。当然，当我们说要努力建构具有中国味道的社会学时，绝不是说我们只要抱持着民粹的情怀到田野中去，进入中国的村庄、工厂和社区就可以了。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恰恰需要对于整个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完整的、长时段的理解。或者说，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建构中，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恰恰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一次特殊的会议：2010 年 6 月 18—19 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为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本文集就是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编订而成，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社会学界尊重并自觉地继承自己的社会学传统。

苏老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自 1978 年后第一位专门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并参加了 1980 年由费孝通先生主办

的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后来正式调到社会学所工作，一直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的全部过程，是大陆社会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于二十多年前完成的《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可谓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韦伯研究的最早开创者，至今仍具有学术典范的意义。

叶老师是台湾 1970 年代就到美国留学并毅然从美国返回台湾任教的社会理论家，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长达近三十年，并曾担任台湾社会学会理事长，是台湾社会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著述等身高，桃李满天下。叶老师曾多次到北大授课，本文集的许多作者都是叶老师当年在北大授课时的学生。

苏老师和叶老师——我们弟子私下称其为“老苏”和“老叶”——一个是地道的北京人，另一个是正宗的台湾本地人；一个是本土自己培养的学者，另一个是老牌的海归学者；一个在北京的最高研究机构里工作，另一个在台湾的最高学府里执教。应该说，无论是他们个人成长的背景，还是工作的环境，都有相当的差异。然而，我们在他们身上却读到了许多共同的风格。

从学问形态来说，作为大陆和台湾社会理论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初受的都是西学教育，他们毕生都对西方社会理论有着精深而典范的研究；然而，他们又心仪中国文化，对西学有着非常自觉而强烈的反省意识，他们都是带着本土问题契入西学的最深处，而后又都倾力于重返本土经验，让社会理论在本土社会生根发芽。而从为人风格来说，他们既认真又洒脱，既深邃又简单，他们都堪称韦伯意义上“以学术为志业”的典范，在其身上洋溢着“理智的正直诚实”之美德。如果用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说的话，他们都是气象大、境界高、修养深的人。

本文集的作者绝大多数都直接受业于两位先生门下。二位师长不仅仅在学问形态上培育和启发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修养熏染了我们——我们平生别无多求，唯愿我们自身像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位师长那样做一个真学者，我们更发愿要像二位师长当年关爱我们一般去关爱我们自己的学生。

近年，苏老师和叶老师分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湾大学荣休。又正值苏老师在本书出版时荣开七秩。我们以文敬师，来表示对两位师长的诚挚感激之情，更希望两位师长所开拓的社会理论新传统能得以发扬光大。

除了本文集的作者外，我们还要感谢杨善华、谢立中、方文、张旅平、李康、吴飞、王楠、白中林和赵晓晴在这次会上所分别承担的主持、评议、发言和录音整理等工作。本文集部分论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们对这些刊物一同表示感谢。

编　者

二〇一一年元月

参考文献

希尔斯，1991，《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叶启政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　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
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李　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赵立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何　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肖　瑛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张文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俊敏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黄厚铭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
徐　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渠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应　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目　录

编前语 …… 1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年 …… 熊春文 1
——苏国勋先生访谈录
临别前的告白 …… 叶启政 36

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 …… 苏国勋 45
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 李　猛 115
“韦伯的帕森斯化”与“韦伯派帕森斯” …… 赵立玮 155
——基于韦伯－帕森斯思想关联性的考察
韦伯关于现代国家与经济发展的论述的初步考察 …… 何　蓉 205
把个人带回社会 …… 肖　瑛 226
从支配关系看中国传统社会 …… 张文杰 272
——韦伯论中国家产制
韦伯的理性“进步”及其意义问题 …… 王俊敏 292

象征交换与“正负情愫并存”现象 …… 叶启政 341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本土化 …… 黄厚铭 388
心的概念与文化自觉的社会学 …… 徐　冰 422
——从苏、叶两位老师的近期观点谈起

卢梭对现代教育传统的奠基 …… 渠敬东 454
“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 …… 应 星 475
——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经术”与“吏事”：中国古代的治理实践 …… 周飞舟 502
——《官箴书》研究提纲

研讨会总结发言 …… 叶启政 苏国勋 应 星 515
苏国勋教授著译年表 …… 519
叶启政教授著译年表 …… 523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年

——苏国勋先生访谈录*

熊春文

〔访者赘语〕1979—1980 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三十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 1978 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三十年间，从硕博期间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二十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审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

---

* 本次访谈主要完成于2009 年七八月间，从初稿到成稿经苏国勋先生多次修改。该访谈稿曾发表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鸿保教授，他在认真阅读访谈稿后通过我的同事孙庆忠教授告诉了我一些史实出入，使得我有机会再次更正一些讹误。——熊春文

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

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的是西学教育，但与中国问题相始终，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发展及其独特品格的最好见证。

一　从外国哲学到社会理论

熊春文（以下简称“熊”）：苏老师，您开始是哲学专业出身，给我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从哲学所到社会学所，完成社会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换的？

苏国勋（以下简称“苏”）：我是1978年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指导老师是贾泽林先生，招生的时候指导老师还有杜任之先生，但实际的业务工作是由贾老师指导的。贾老师曾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专攻苏联东欧哲学，为人勤奋、诚恳，是我的开蒙老师。杜先生是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他早年曾在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山西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第一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但他不愿意做官，坚持到社科院做研究员。1978年开学之后，导师与我和另外一位研究生谈论文方向。最初与我们商量的论文方向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我们觉得这种论文题目太陈旧写不出新意，希望能以一些新的知识领域为题，后来改为人的问题和社会（学）理论问题，最后我选了社会学理论做研究方向。当时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比较详细地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及其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从孔德开始直至现在的社会学理论的衍变沿革，其中必然涉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苏联和中国取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学的这段历史问题。最后决定我的论文方向是考察社会学在苏俄的经历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社会理论问题，目的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1981 年硕士毕业后被留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工作，1983 年社科院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我又考取了陈元晖先生的博士生。陈先生为人正直谦和，做学问兼收并蓄，常用王国维所说——实证主义可信而不可爱，人文主义可爱而不可信——的思想启迪学生，强调做学问博采众家之长与做人从善如流二者之间的统一，并身体力行，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可说终生铭记，受益匪浅。先生本意希望我以社会心理为攻读方向，后见我志不在此，遂同意以社会理论为研究方向，这样我就于 1987 年底以韦伯的哲学—社会学思想为题通过论文答辩后一直留在社会学所工作。

我虽然是在哲学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但两次论文都不是纯哲学题目，可又都与哲学直接相关，前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后次韦伯的思想属于新康德主义，两者都处于社会学思想史领地，亦都属于社会理论，从学科分类来看，显然都属于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改革开放伊始，社科院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尤其哲学所，学术门类齐全，人才济济，实力雄厚，而且在学术见解上也颇具前瞻性眼光。

熊：这里面可能涉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理论的关系问题，您是怎样理解它们之间关系的？

苏：我个人更钟意于社会理论的概念。在我看来，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经验科学，首先，它的理论、范畴和概念必须来源于经验事实并要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其次，既然是科学，就必须要对对象作出因果性说明。社会理论以此两点与社会哲学区分开来。可是社会现象是由人们行动造成的结果，他除了具有自然现象的表层实体结构之外，还具有自然现象不

具备的深层意义结构，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不同动机驱使做出的，因此要对人的行动做出因果说明，必须首先对人们赋予行动的动机—意义做出诠释性的理解方能奏效。社会理论据此与主张完全模仿自然科学经验方法的实证主义进路区别开来，“二战”前后美国版本的社会学理论对工具论的实证主义进路推广不遗余力。这一点既是美国社会学的成就，也是它的缺陷。此外，说句题外的话，套用吉登斯的说法（我忘记具体出处了），“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本身就是个蹩脚的英文词，既然“理论”（theory）何必“逻各斯”（logos），画蛇无须添足。在我看来，社会学研究是一架由**因果性说明**和**诠释性理解**双轮驱动的车子，两个轮子犹如人的两条腿，其中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二者缺一不可。社会哲学从语义上和社会学理论在具体做法上都只褒扬一个方面而贬抑另一方面，社会哲学则只关注社会现象的形而上方面，排斥其经验属性；美式的社会学理论则追随实证主义把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经验事实，完全排斥宏观理论并贬低社会研究必然包含的预设层面中的形而上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亚历山大的说法，社会学研究始终是穿梭于经验环境与形而上环境之间双向往复的运动。比较平实贴切的概念，应该是基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理论，它是古典的从宏观结构和历史变迁上研究社会的科学与现代从微观行为动机和后果上研究人的科学的综合。基于此，社会学所的建制里一直用“社会理论研究室”而不用人们习惯使用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一字之差表明在社会认识上意欲摆脱实证主义羁绊的初衷。

其实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传统，历来是二者并举的，只是在社会学传入以后，因为经验研究的方法、技术、程序方面的匮乏，为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接受了实证主义的

一些做法。这样说来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论研究本来就很好、就很有成效，不是这个意思。传统的社会研究由于受伦理本位或者政治挂帅的影响对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说明迄今一直是我们的软肋，但不能因此就矫枉过正地一头又扎进实证主义的怀抱。

熊：请谈谈您硕士论文所触及的问题。

苏：我的硕士论文是专门考察苏联社会学的。简单地从过程上说，它涉及1936年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教程》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后，导致以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后果；以1956年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为标志，苏联重返国际学术界并承认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为反驳西方的恶意攻击，遂声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具体社会学研究所，1972年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体制接纳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1970年代后期，借鉴西方社会学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中层理论”作为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衔接，至此三级结构的“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架确立。这些事件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在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而无人问津了，但其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还是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历史唯物主义到底与社会学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

熊：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学理论以及中国社会学很重要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苏：简单地说一下我的看法。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观点的“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唯物史观的确立几乎与孔德命名社会学发生在同时，马克思的目的在于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这个最后避难所驱除

出去，他非常反感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中的三阶段发展模式的唯理智论—唯心论性质和以“秩序/进步”为目标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立场，因此他从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并拒绝把他的任何思想与“社会学”相联系。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在整个 19 世纪里，当社会学还被广泛定义为“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时，唯物史观所重点阐发的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和历史过程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资本论》从商品这个现代社会最简单、也是最复杂包含了其全部矛盾的始初范畴出发，层层剥笋般地分析了它与劳动之间的辩证的矛盾运动，从而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前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社会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出现成为可能”；被列宁评价为“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也为其 1921 年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材”的副标题，称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此后，这种提法不胫而走一直延续下来，持如是说法迄今不绝如缕，仔细揣摩并非没有道理。另外还必须看到，现代社会学包括对象和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已远不是孔德时代或者布哈林时代的社会学可比了，它已经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成为一门通过社会行动研究社会运行状况及其结构和变迁规律的一门经验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这个提法的长处在于它从意识形态立场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观点的社会学性质，缺点在于既然承认其社会学属性就需在一般理论之下补充它必须具备的部门（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包括方法、手段、程序），而不应把历

史唯物主义当成全部社会学。这个提法的优缺点也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近两百年发展过程内在矛盾的外部显现，在今天它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并非是它历史地还带有从其哲学母体中分化过程的浓厚痕迹，而是因为现实的它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侵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地盘。换言之，迄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里尚无社会学的合法地位，尽管这门学科在科研和教学上已经恢复了三十年，这也是在面对国际学术界纵论古典社会理论“三个伟大传统”而首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我们却环顾左右而言他、备感尴尬的原因。“新故相悖，前后相谬”何至于斯。

二　社会学重建与社会学讲习班

熊：您博士毕业后就到社会学所工作了？

苏：是。我虽然是 1988 年初才正式到社会学所工作的，但很早就参加了社会学界的活动，譬如参加武汉、呼和浩特、伊春会议，参与筹备大连国外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参加第一、二届讲习班以及社会学所内的一些学术活动。

熊：您给说说社会学重建和社会学建所的情况。

苏：社会学重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根据这个精神找费孝通谈话，要恢复社会学，要建社会学研究所。具体实施是在 1979 年底 1980 年初，在社科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学被取缔近三十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又破土复出了。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不久，国家经济形势还有许多困难，社会科学界更是

百废待兴，研究所建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建立科研队伍。这也是建所之初为什么连续两年举办讲习班采取“请进来”的办法让外国教授为我们培训科研人员的背景。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勉为其难的变通举措，可在当时，讲习班结束后不久还是在社科院引起了一些非议。

熊：当时社会学所重建的时候，社会学所除了费老，还有些什么人啊？

苏：费先生找了一些原来学社会学后改做其他事情的人，具体事务是由王康负责。社会学所成立后费老任第一届所长，王康任副所长，后又陆续调来张仙桥、潘乃谷等人，他们大多是费先生在原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生或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后人。说到社会学恢复重建一事，我想还应提到杜任之先生的名字。1970 年代末，杜任之先生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其他场合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并积极支持费先生主持建立国家级的研究所和全国性的学会。杜老对刚刚复出的社会学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口头呼吁和表态上，而且还落实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记得 1981 年我刚刚进入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杜老作为研究室主任就给我分派了任务，要我在一周之内提交一篇介绍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文章，以填补研究室集体撰写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中“社会（学）哲学”栏目的空白，并嘱咐我续集付梓在即，一定要抓紧时间增开栏目和加写文章，以示兄弟学科对恢复社会学的声援。这就是在当年出版的、由杜老领衔主编的该述评中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一文的出笼经过，尽管现在看来文章很肤浅很幼稚，但毕竟是国内较早在正式出版物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评介，我个人更看重的是这件事显示出杜老为人为学的品位。更难能可贵的是杜老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1980 年代初他身体力行多次亲自参与社会调查，我当时作为学生有幸陪同杜老多次到北京清河社会福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